

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 理路探析

王丽鸽 李炳毅

【提要】媒介间的融合滋生着传播模式的复合性选择,技术革命的演进重塑着人类社会的结构化情境,符号变迁的路径勾勒了网络空间的文化边界,符号建构的空间折射着网络意识形态中层级各异的数字景观。为此,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问题,要着眼于理论自身的理性权威,以理论自觉为基点,赢取民众虚实合一的理性认同;以角色期待为动力,理性回应社会实践的现实挑战;以思维转换为理路,拓展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视野。

【关键词】网络空间 主流意识形态 网络安全 网络强国

〔中图分类号〕B0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6)05-0023-06

20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强势推进,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元化程度也日益加深,使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长期深陷于多元而复杂的文化冲突与价值碰撞的漩涡之中。为了积极回应实践发起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民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民利益。”^①依托于信息技术的网络空间全面映射着现实世界,对自然空间进行着符号化的扩展和技术性的延伸或浓缩,使得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再次面临前所未有的境况。

一、发展境遇:主流意识形态 建构的生态变迁

网络信息时代,人类基于自身生产生活的实践能力和超越现实的文化本性,通过数字化思维极大地延伸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时空界域,

借助符号化表达为人类提供了一个网络化的生存空间。社会实践深入所引发的境遇变迁,既需要理论的指引,更呼唤理论的创新。“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②透析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生态,既是建设网络良好生态的题中之义,更是推进理论创新的应然之举。

(一)复合性选择:主流意识形态的融合传播

借由信息传播科技的推动,人类进入传播新纪元。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的网络空间,正在和已经造成了媒体格局的又一次巨大变迁。网

^① 《习近平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强调: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人民日报》2016年5月18日。

^② 《习近平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强调: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人民日报》2016年5月18日。

络空间下，人、社会以网络信息技术为基础进行信息收集、传递、贮存、加工、维护和使用，组成一个现代化信息系统，信息传播已成为网络空间内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交往方式。媒介系统与信息系统的“联姻”，丰富着社会总体表达形态。网络信息技术的进步增进了传播方式的现代性变革，推动着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性发展。在新媒体发展和全球化传播的进程中，一个跨媒介、跨产业的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日渐形成。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加速融合的过程中，媒介间的融合使得传播模式愈加复杂，传播主体日益多元，传播内容日趋复杂，传播渠道不断分散，传播效果难以预估。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特征更加凸显了新时期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性，“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① 传播格局的变迁重构着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媒介生态，不仅改变着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同时也挑战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逻辑。

网络空间的生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带来了新的挑战，也开启着新的篇章。“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② 为了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和激励作用，将一种理论性的思想体系切实高效地内化为民众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势必要经过一系列科学而完整的宣传教育。网络空间架构于虚拟与现实两个生活世界，涵盖了线上和线下两大话语体系，融合着传统与现代两种传播模式。网络空间为不同利益体、多种发声体提供了一个共同“透析”社会问题的平台，滋生着样态万千的“意见群”，通过社会性交流、探讨以形成所谓的“公认意义”。这种“择善而从”的意见互动方式和传播模式，正在逐渐生成一个相对开放的网络意见空间。为了确保主流意识形态在多元文化和价值碰撞中的理性权威，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多重意识形态冲击中的主导地位，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建构势必要积极进行复合性选择，其传承传播的过程同传统与现代、虚拟与现实以及技术与社会间的融合发展具有内在同构性。

(二) 结构性变迁：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边界
无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如何变迁，文化的演变始终同构于人类的进步。“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③

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实践伴随着信息的交流和融通，也必然伴随着文化习惯、民族情感、传统价值的碰撞乃至冲突，这就使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问题在翻涌的意识形态冲突中如海上之冰山凸显于世。一方面，网络空间内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过程，要确保网络信息时代赋予的全新符号表征方式依托民族心理习惯，融于民族文化传统，顺应民族思维方式，符合民族价值准绳，在多元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碰撞中，明晰文化边界。另一方面，网络空间内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过程，要确保重组的意义秩序，同时兼顾“自觉”和“自卫”。技术的进步一次次为人类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搭建起桥梁，但也像一面镜子，毫无遗漏地折射着崭新的社会矛盾。网络技术平台放大了现代意识与传统意识的时代裂痕，交融了全人类意识与阶级意识的社会冲突，突出了多元意识与民族意识的价值碰撞。面对复杂多元的网络生态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必须正视技术变迁带来的社会结构性变迁，遵循网络社会的文化边界，既要自觉于主流意识形态自身的理性权威，也要建构严密安全的意识防御体系，“全天候全方位感知网络安全态势，增强网络安全防御能力和威慑能力”。^④

(三) 技术性构建：主流意识形态的数字景观
网络技术时代的到来，不仅标志着人类发展史上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极大进步，在文明进步的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

① 《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正确方向 创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人民日报》2016年2月20日。

②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③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④ 《习近平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强调：在践行新发展理念上先行一步 让互联网更好造福国家和人民》，《人民日报》2016年4月20日。

社会心理及观念意识的多样性。如果网络信息技术的每一步进展都牵动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建构的生态变迁，那么，这种因技术性存在而自发形成的心理特征和思维定式，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或分散着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值得重视的原因恰恰在于这种消解或分散的程度的不确定性，时刻存在着背离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民族的价值主体的倾向，时刻威胁着共同体生存发展的前途和命运。从技术层面看，技术的本质是人类高度实践性的智慧和技巧，技术的发展和演变正是人类不断获得自我解放和自由的过程，科技发展的不可限量令我们难以断言人类未来的生存图景，但可以确定的是，技术的日新月异的确引发了技术与思想和社会之间的博弈及争论。汤姆森曾归纳了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的五种运作模式，即合法化、掩饰、统一化、分裂和具体化。这一论断旨在表明意识形态通过运作符号可以建构真实，从而建立和维系支配关系。借助汤姆森的视觉角度，分析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生态背景，的确可以形成一面镜像以折射网络意识形态中纷繁复杂、层级各异的数字景观。

网络空间内的意识形态争鸣同样无外乎两种路径，一方面向与己相悖的意识形态宣战，另一方面强力验证自身的理性权威，进而“营造出一种能提供政治认同及引导民众政治态度的符号模型”。^①其一，网络意识形态间的不同独白恰恰是借助网络技术平台，以网络文化品牌塑造、网络舆论传播引导、网络交互机构设置等方式实现自身支配关系的合法化。其二，源自不同民族信仰、文化背景、利益集团的网络发声体，在面临价值冲突和舆论风暴的挑战中，往往通过掩盖、否认、模糊或分散注意力等掩饰路径，来继续维系或进一步扩大自身的支配关系。其三，为了最大程度地聚合网络意见共同体，力争在符号层面建构涵盖个体的统一体，淡化共同体间的差异和分歧，以实现共处状态中异质层面的统一化。其四，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分裂是以分化和消灭他者为策略，强调个体或群体差异、塑造及排斥他者，来防止对方形成集体意识和行为，以疏离对方合法

性为手段来形成自身的统一性。其五，具体化是指将并非必然、恒久的支配关系表征为永恒自然，网络空间内的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必须注意与“网络社会意见气候”的交感共鸣，有效地强化自我的理性权威和价值认同。

二、生成图景：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践行理路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② 社会实践的发展和人类科学认识的巨大进步，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产生提供了必要和可能。为了回应时代的需要并遵循历史发展的必然，网络空间的主流意识形态建构必须保持高度的理性自觉，充分发挥理论魅力，来滋养人心和社会；必须果敢地对接社会现实问题，确立行之有效的践行思维和路径，以积极营建网络良好生态。

（一）发展基点：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性自觉

网络空间的符号化、数字化思维方式源自人类自身适应环境、超越现实的文化本性。技术不仅是人类借以实现超越的条件，也是人类生存需要得以充分展现的平台。网络信息时代，技术打破了传统的地域限制，拓展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增强了信息流通的自由度和舆论传播的开放度。

无可否认的事实是网络技术具有中立性，但技术承载的信息、技术运作的主体、技术建构的场域却被粘贴上了不同意识形态性的标签。进而，不同价值观、理论和政治倾向便物化在了形态各异的网络交往路径之中，渗透于网络受众的交往过程中。网络空间由不同“文化代码”直接或间接地发出的意识形态输出、价值引导、道德模式、政治思想的“射线”相互交错，使得意识形态的传播和认同、价值观念的

^① [英] 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主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4页。

^② 《习近平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强调：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人民日报》2016年5月18日。

传承和取舍以及政治思想的判定和选择，都在不同“射线”的干扰下发生偏移。社会实践反复证明，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魅力来源于自身的理性权威，只有全面发现并充分肯定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张力和实践号召力，才能解密网络数字符号背后的价值所指，才能识破网络信息代码背后的文化渗透，才能确保网络社会浪潮跌宕后的信息安全。充分的理性自觉是塑造主流意识形态理性权威的逻辑基点，只有正视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感召力和现实影响力，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才能主动迎接环境变迁的考验，才能真正引领时代发展。因而，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要着眼于理论自身的理性权威，这是占领网络阵地、赢取民众理性认同的逻辑基点。

(二) 内生动力：主流意识形态的角色担当

哲学不能“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 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表达与现实建构，并非依靠单向度的自我宣扬和高压灌输等方式所能达成，其理性权威原本就彰显于伟大的社会实践中，其建构过程势必结合时代、贴近现实。关于社会实践的现实挑战所给予的理性回应和角色期待，将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持续动力，从实践哲学的层面出发，其本身应当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主题”。^②

首先，担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引领者。“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所提及的一个新概念，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时代化和具体化的阐释。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和维系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该过程不可规避地存有诸多争议和难题。主流意识形态将立足人类共同的技术生存空间，不断增强自身理论的科学性，凝聚力量，汇集智慧，推动网络空间互联互通、共享共治，开展互联网国际合作，构建公平公正的互联网秩序，为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助力。

其次，担当网络强国战略的精神护航者。网络强国战略的提出，旨在兼顾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两大重点工程，以实现国家网络安全和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互联网+”经济形态的出现，将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深度融合互联网的创新

成果于实体经济，进一步增强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增长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③ 在鼓励产业创新、促进跨界融合、惠及社会民生的过程中，既要持续以“互联网+”为驱动，更要强化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精神护航作用，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创新发展。

再次，担当网络舆论战场的思想守卫者。“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这一观念日益得到证实和重视。与此同时，网络空间所承载的思想文化信息和社会舆论，也在深刻地影响着受众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文化传承和生活方式。面对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阵地所潜在的威胁和冲击，必须汇集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力量——从党员干部到普通民众，捍卫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最后，担当网络文明建设的道德传承者。网络空间营造了一个信息多元化的时代，价值的碰撞、思想的交锋所绽放的是人类文明的火花，然而，伴随着网络技术时代人类生存方式的巨大变革，带来的不仅是网络空间思想、观念的频繁流动，网络社会的价值系统中也杂糅了一些不健康的、腐朽的、落后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而且这类信息并不在少数。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本着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④ 就社会心理而言，道德的视角比理论的视角更容易被公众所接受，主流意识形态本就具有化育社会道德的功能，面对网络空间道德文明的巨大挑战，更应积极主动地为推进网络文明建设发挥自身理论的价值张力。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

^② 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③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

^④ 《习近平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强调：在践行新发展理念上先行一步让互联网更好造福国家和人民》，《人民日报》2016年4月20日。

（三）思维转换：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理路构想

在信息时代，网络空间以符号化的形式集中映射着现实社会，不同的发声体也借助符号密码对现实生活进行着不同的解读和演绎。网络空间数字化密码的背后潜藏着各自独立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解构也建构着我们的生活世界，为此，必须转换固有发展思维，培养空间性、选择性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为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拓展视野。

1. 空间性思维：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虚实转化

网络虚拟技术以符号化的方式拓展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在线时空与物理时空并存，虚拟环境与现实环境相连，使人类能够在“虚拟”和“现实”两种时空之中自由转换。互联网的最大成功不在于技术层面，而在于对人的发展的影响，它拓展了人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丰富了人的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我们既要看到其带来的革命性效果，又要看到其带来人的发展场域的分化与融合，并努力探寻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路径。

网络空间重组了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伴随人类虚拟实践的逐渐深入，个体意识在虚拟技术空间内率先觉醒，并日益强劲。网络空间具有不可估量的聚合力，将社会舆论和民众心理迅速集成网络舆论。技术进步推演文明变迁的光环始终无法掩盖技术本身所放大的社会矛盾，网络信息技术的虚拟性、交互性和分散性等特征愈是凸显，就愈加证明了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引导的重要性，就愈加警示我们虚拟实践将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关键环节。意识形态的建构过程有着自身不可变更的铁律，即只有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不断创新理论内容，不断强化理论张力，才能有效地解释世界，科学地改造世界。积极建构空间性思维，有助于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的虚实转化，这既是保证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现实选择，更是社会实践发展的现实需要。

2. 选择性思维：整合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合法资源

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过程中不可规

避一个实然景观，即永远面临“选择”和“被选择”两种境遇。网络空间维度下的信息社会，激荡的是文化争鸣的波浪，涌动的是价值碰撞的浪潮。为了建立和维系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性地位，必须建构选择性思维，伴随网络空间虚拟实践的发展，整合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合法资源，使得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性权威在揭示现实世界和指导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得以彰显。

首先，从“选择”境遇出发，积极主动地开展行之有效的资源选择行为。正确处理意识形态指导思想一元性与社会价值观念多样化之间的关系，准确把握意识形态的传播与发展规律，选择优秀的传统内容和先进的时代内容来发展理论，选择高效的网络平台和便捷的技术支撑来宣传理论，选择合时的舆论热点和合适的话语方式来输出理论，选择合情的网络环境和合宜的网络群体来应用理论，以促进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虚拟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

其次，从“被选择”境遇出发，“网民作为网络信息的受众，对网络信息也不是完全被动的，而是受自身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倾向性的影响，具有主观选择性”。^①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和虚拟性，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自主意识，选择对象的多元和选择成本的降低提升了民众自由选择的意愿。既然已经证明网络空间多种意识形态并存的事实和受众具有主观性选择的行为，那么建构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就必然面临被受众“选择”的境遇，这就要求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传播，必须避免单向度、高压式的强势灌输，积极整合网络数据资源，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理性权威和价值魅力。

3. 创造性思维：优化主流意识形态建构的拟态环境

网络空间是现实世界的技术化成像，但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技术也日益规约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方式，正如马克思当年曾指出的，“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

^① 聂立清：《我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83页。

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①

从价值层面讲，创造性思维是人类客观认识网络世界的思想武器，是人类理性对待技术异化引发的科技漩涡的方法论。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将丰富和发展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在网络社会人的现代化过程中，明确技术的工具属性，突出人的主体地位，追求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的对接，使科技真正成为人的“自由的生命表现”。

从理论层面讲，网络空间的信息传播方式促成了个体话语和小众话语气象，网络表达呈现出散点辐射、触角延伸的态势，它消解着中心话语的传播方式，改变了传统大众媒介信息传播的单向性和信息接受的被动性，逐渐形成双向性的信息传播交流的路径。为此，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建构必须遵循网络传播的规律，发挥创造性思维，借助技术平台，合理架构网络交往活动的主体关系和行为方式，进而培养正向的网络意见领袖，在网络交往中形成主导的意见流，引导舆论走向理性。

从实践层面讲，十三五规划建议中“网络

强国战略”的提出，网络安全维护和信息化工程建设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中的工作重点。面对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进步，党和人民自信而果敢地做出了理性回应，“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这是遵循亦是目标。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建构解决的不仅是技术变迁带来的挑战，还要接受社会进步发起的挑战，积极培养创造性思维，建立起符合时代特点和要求的现代思想体系，以提升马克思主义的凝聚力，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本文作者：王丽鸽是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李炳毅是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甘肃农业大学纪委书记
责任编辑：周勤勤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页。

An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yberspace

Mainstream Ideology

Wang Lige Li Bingyi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mainstream ideology faces unprecedented environment and situation. Media integration makes the mode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diversify. The evolution of technology revolution reshapes the structured situation of human society. The path of symbolic change draws the cultural boundaries of the cyberspace. The space for symbolic construction reflects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digital landscape in network ideology. Therefore, the construction of cyberspace mainstream ideology must focus on the rational authority of the theory itself. It should also try to win people's rational recognition both on-and off-line on the basis of its theoretical consciousness, respond rationally to the challenges of social practice in line with people's expectation of its roles, and expand the horizons of construction of the cyberspace mainstream ideolog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oughts.

Keywords: cyberspace; mainstream ideology; network security; internet power